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江西党史资料

五四爱国运动在江西专辑

江西党史资料

第九辑

(五四爱国运动在江西专辑)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一九八九年三月

《江西党史资料》编委会

主 编：余伯流

副 主 编：陈立明 孟晓敏

编 委：刘忠武 蒋 伟 赵 敏

朱德久 黄益姣

本期责任审稿：余伯流

本期责任编辑：张英南

目 录

综 述

五四爱国运动在江西 (1)

历史文电

- 一、力争收回青岛，释放北京学生 (64)
- 二、惩办卖国贼，拒签巴黎和约 (86)
- 三、组织学生联合会、女界联合会、国民大会、
各界联合会 (106)
- 四、声援“济南血案” (141)
- 五、抵制日货，提倡国货 (148)
- 六、救济南津浦铁路 (185)
- 七、禁止米谷出口，声援“福州血案” (200)

组织名录

五四爱国运动在江西有关事件和团体人名录(276)

史实考证

五四爱国运动在江西若干问题的探讨(282)

大 事 记

五四爱国运动在江西大事记(289)

后 记(304)

五四爱国运动在江西

陈立明

1919年5月至12月，一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为内容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席卷全国，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奋勇抗争的英雄气概，给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以严重的打击。在这场爱国运动中，江西人民与其他各省人民相配合，积极投入到运动中去。它以爱国的知识分子为先锋，工、商、绅各界为后盾，以南昌、九江为重点，其他各县响应，不仅有全国共同的内容，而且有本省独具的特色，其持续时间之长，发动面之广，声势之浩大，为以往的群众爱国运动所未有，为江西现代史的开端，写下了极为光辉壮丽的一页！

一、江西人民对五四爱国运动的声援

（一）巴黎和会的不公正裁决

1919年春天，严重的民族危机笼罩着中华大地，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频频传来。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之一的中国，不但向巴黎和会提出的七条希望条件一条也不能解决，而且还要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转让给日本。德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中国是战胜国，德国在战前侵占中国山东的一切权利理应由中国收回。然而，操纵巴黎和会的各帝国主义国家，竟然在巴

黎和会上作出这一无理裁决。这是中国人民不能答应的。因此，当这一消息传到中国时，全国人民大的震怒！江西人民大为震怒！一致誓言：绝对不能接受这屈辱的条件！要反对！要力争！成为包括江西人民在内的全国人民的一致呼声和要求。这年5月4日，由北京学生发起、得到全国人民响应的一场震撼全国的爱国运动，就是由于巴黎和会的不公正裁决引起的。

巴黎和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举行的会议，是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的分赃会议。和会从1919年1月18日开始，至6月28日结束，历时五个月零十日。参加会议的有英、法、美、意、日、中等二十七个国家，但实际上是由美、英、法、意、日五国，特别是美、英、法三国操纵着会议。和会最初由美、英、法、意各国首脑和外交部长、以及日本的两个特别代表组成“十人会议”，后来又由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伦·乔治、法国总理克里孟梭、意大利总理奥兰多组成“四人会议”；美、英、法、意四国外长和日本代表组成“五人会议”。“四人会议”是和会的决策机构，由于意大利因本国要求未能达到而中途退出会议，一切问题就由美、英、法三国决定，其他国家只能在讨论到和自己有关的问题时才能出席。

巴黎和会召开时，中国正处于两个政府并立的局面。由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全国大部分省区在北京成立的政府，史称北京政府，徐世昌为总统，钱能训为总理，但实权却操纵在北洋军阀皖系首领、亲日派头子前总理段祺瑞手里；统治云南、广东、广西、湖南等省的地方军阀在广州组成的政府，史称军政府，唐绍仪、唐继尧、陆荣廷、伍廷芳、孙中山、林葆怿、岑春煊等七人为总裁，岑春煊为主席总裁。从1918年1月起，南北两政府先后在湖南、湖北、赣粤边、闽粤边和陕西等地发动激战，最后在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停战和南北双方“两败俱伤”的情况下停战，并于1919年2月20日在上海召开和平会议，史称上海和会。因此，当巴黎和会召开时，上海和

会也同时举行，形成两个“和会”同时召开的局面。尽管全国人民一致要求“速息内争，一致对外”，但双方在许多问题上讨价还价，使上海和会开成了一个“马拉松”式的会议，时停时开，形成僵局，最后拖到5月13日，才在全国人民一片爱国怒吼声中毫无结果地宣告结束。

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正式开幕。中国出席和会的代表由南北两政府共同委派：北京政府的外交部长陆征祥为首席代表，驻美公使顾维钧、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比利时公使魏宸组、南方军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为代表。这时，日本政府在外交上大肆活动，指责中国政府参战不力，没有资格参加和会。但由于中国人民强烈的要求和美国不愿看到日本独霸中国，日本的阻挠未能得逞，中国代表仍然出席了会议。

和会召开前，美国总统威尔逊在美国国会上发表演说，提出了关于处理各国关系的十四项原则。在这十四项原则中，主要是：“凡外交事项，均须开诚公布执行之，不得秘密从事”；“对于殖民地之处置，须推心置腹，以绝对的公道为判断”；“殖民地人民之公意……各国须绝对尊重，不得丝毫假借”；“国无大小，一律享同等之利权”等。这位国际权威人士美妙动听的演讲，受到了世界弱小民族的热烈欢迎，也曾博得中国人民的普遍称赞，认为人吃人的强权政治终将结束，人类平等的美好理想即将实现。当时，中国人民虽然初步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但还不知道用它作为照妖镜，来洞穿帝国主义的本质。因此，北京的不少学生，曾跑到美国使馆门前高呼：“威尔逊大总统万岁！”就连民主激进者陈独秀，也在《每周评论》上发表文章，称赞“美国大总统威尔逊屡次的演说，都是光明正大，可算得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认为：“他说的话很多，其中顶要紧的是两主义：第一不许各国拿强权来侵害他国的平等自由。第二不许各国民政府拿强权来侵害百姓的平等自由。这两个主义不正是讲公理不讲强权吗？我所以说他是世界上第一个好

人。”^①中国另一位名人梁启超想得更妙，他认为天下从此太平了，帝国主义不再会侵略中国了，中国的国防也不要了。他发表文章说：“今次之战为世界之永久和平而战也”。中国“宜率先厉行裁兵。”“盖侵略主义既为天下所共弃，此后我友邦断无复有以此加诸我。藉曰有之，而亦必有其他方面之制裁，使莫能发，故此后更无国防之可言。”^②

正是在各国列强必然平等待我的幻想下，全国人民对巴黎和会充满了希望。巴黎和会开幕时，许多报刊著文庆祝。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1月5日著文说：中国从此可以“挽百十年国际上之失败”，中国能够“与英法美并驾齐驱”。中国许多群众团体，也打算派代表向和会申述正义要求。其中“留日学生救国团”在提议组织国民赴欧公诉团的意见书中说：“兹值欧战结束，和会开幕，强权失败，公理昌明。正我国人民仰首伸眉，理直气壮，求公判于世界各国之会。”^③

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对和会也充满着希望。中国代表团最初向和会提出希望条件共七条：一、废弃势力范围；二，撤退外国军队、巡警；三、裁撤外国邮局及有线无线电报机关；四、撤消领事裁判权；五、归还租借地；六、归还租界；七、关税自由权。后来，又在中国留欧学生的要求下，增加请求取消1915年5月所订的中日协约（即二十一条）及换文的陈述书。很显然，这是幻想把帝国主义在中国攫取的种种特权加以收回，把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加以废止，把日本利用欧战机会与中国订立的二十一条密

①《〈每周评论〉发刊词》1918年12月22日。《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出版，第304页。

②梁启超：《国际联盟与中国》。见《东方杂志》第16卷第2号，1919年2月出版。

③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2月4日。

约，在美国总统威尔逊的主持公道下加以撤销。

但是，中国的七条希望条件和取消中日协约的正义要求，在提交到和会最高会议时，却遭到了拒绝。和会议长克里孟梭在致中国代表的复函中说：“联盟共事领袖各国最高会议，充量承认此项问题之重要，但不能认为在和平会议权限以内。拟请俟万国联合会行政部能行使职权时，清其注意”。这就是说，中国所提这些希望条件重要是很重要，但就是不能解决，因为解决这些问题不在和会权限之内；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只有等到将来“万国联合会”行使职权时再说。这无异给中国代表当头浇了一盆冷水。

既然七条希望条件和废除二十一条的要求不能讨论，剩下的唯一希望就只有山东问题。1月27日，“五人会议”第一次讨论德国在山东的权益问题，中国代表被指定列席。会上，日本代表提出了事先准备好的日本政府宣言书，声称胶州租借地及铁路以及在山东所有权利，应该无条件让与日本。中国代表开始对山东问题认为可以包括在希望条件和废除二十一条的提案中了，当日本代表提出上述宣言时毫无思想准备，只好说希望等中国代表申诉理由后再行讨论。

中国在山东的权益为什么反而要交给日本？要说清这一问题的历史背景，必须对德日两国侵占山东和青岛作一简要回顾。1897年11月1日，山东省巨野县的农民和大刀会众，把在该县传教的两名德国不法教徒杀死。久想侵占中国的德国政府，即以此为借口，于同月14日出兵强占山东胶州湾，迫使清朝政府签订了中德《胶澳租界条约》，把胶州湾以九十九年的期限“借”与德国，并准许德国在山东建造胶（州）济（南）铁路，铁路沿线三十华里以内的矿产，也归德国开采。1904年，德国把胶州湾的租界新区定名为青岛，在这里实行治外法权，使青岛成为“国中之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乘机于1914年11月向德国宣战，它不向德国本土进攻，却不顾中国政府的抗议，派兵强占青岛，到1918年第一次世

界大战结束，还继续赖在青岛不走。

1月28日，“五人会议”又讨论山东问题。中国代表顾维钧从山东的历史、地理、文化各方面申述了自己的理由，说明：“胶州租借地、胶州铁路及其他一切权利，应直接交还中国。青岛完全为中国领土，当不容有丝毫损失。”^①顾维钧还说：“日本为中国逐出德国势力于山东……中国所当竭诚申谢！然割让中国人民天赋之权利为报酬，而播将来纷争之种子，为本全权所不得不力争者也。”^②日本代表牧野继起发言，说：“日本占领胶州湾后迄至今日，事实上已为属领”，并说“中日两国间，已有交换胶州湾交还之约，并关于铁路，亦有成约。”^③中国代表申辩说，中日间的密约，中国系被迫而订，而且是一种临时办法，应该由和会作最后的审查解决。

牧野说的铁路“成约”，即1917年中日双方在签订济顺、高徐铁路借款协定时章宗祥致日本的那个“欣然同意”的换文。这个换文，不仅当时其他国家代表不知道，就连中国代表顾维钧也不清楚。在这次会上，牧野虽然暂时没有公布这个换文，但他发表了1917年初日本同英、法、俄、意签订的秘密谅解协约。当公布这一秘约时，中国和美国代表都感到惊愕，而英、法、意代表则默然不语。俄国因已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被拒绝参加和会。这就说明，英、法、意等国代表之所以同意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是因为早在1917年初就暗中与日本进行了交易，把中国的领土主权做了人情。

2月15日，中国代表将山东问题的说帖以及中日两国所订的二十一条、济顺高徐铁路合同及解决山东问题的换文等送交和会，希望美、英、法等国主持公道。3月10日，日本首席代表发表关于山

^{①③}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七卷第241页。

^②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七卷第265页。

东问题的宣言，说什么“关于胶州湾问题，对于中国并不为何等之要求，故无从谅解责问之趣旨。但关于解决此问题之根本之基础，中日两国间业已解决。”^①这番话说明，日本享有德国在山东的各项权利是合法的，有条约为证，将来如何办，由日本和中国直接交涉，和会及其他国家无权过问。

此后，中国代表在会外曾进行了一些活动，但都没有取得积极效果。4月16日，“五人会议”第三次讨论山东问题，中国代表被禁止参加会议。美国代表在会议上提出德国在山东的各项权利，由和会暂收的提议，遭到日本代表的拒绝。日本认为：“青岛问题中日业有成约，应交日本转交。”讨论结果，“英、德、意各外部均缄默，美外部遂搁议。”^②4月17日，和约起草会开会，美国代表又提出德国在中国的各项权利、利益交五国共管的建议，再一次遭到日本的拒绝。日本代表说：“日本在中国有特殊利益，对于中国问题由五国处置一层，不能同意。”^③

4月22日，和会召开大会，中国代表被邀出席。美国总统威尔逊再也不唱“国无大小，一律享有同等之利权”的高调，表示对日本的蛮横态度无能为力，并质问中国为什么“欣然同意”与日本订约（指1918年所订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英国首相劳尔·乔治也向中国代表表示：“现为条约所拘束，殊无可如何。”^④他提出两项解决办法，一为按照中日成约办法，一为使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由中国任选一种。这两种办法，实际上就是一种办法，因为不论选择那种办法，都只有让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法国总理克里孟梭则对英首相的意见表示附和，说：“英总理所言，亦即完全为我之意。”^⑤美、英、法三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就是这样一

①《东方杂志》第16卷第4号。

②③④⑤陆征祥1919年4月18日给北京政府外交部的密电。转见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七卷第313页、315页、316页。

唱一和，完全暴露了帝国主义列强恃强欺弱的本质。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代表于4月24日向和会提出了四项折衷办法：“一，胶州为交还中国起见，先交五国暂收；二，日本承认于对德和约签字日起一年以内实行上条之交还；三，中国重视日本因胶州军事所有费用等，愿以款项若干作为报酬，其数额由四国公决；四，胶州湾全部开作商埠，如有必需之处，亦可划一区域作为专区，任缔约国人民居住通商。”

这四项折衷办法，可以说是十分忍辱负重的让步。但是，中国代表的让步，也被美、英、法三国拒绝。4月29日，三国再次开会，日本代表被邀出席，中国代表被拒之会外。4月30日，三国继续开会，议定了巴黎和约关于山东问题的下列条款：

（一）第156条，德国将按照1898年3月6日与中国所订条约及关于山东省之其他文件，所获得之一切权利所有权及特权，其中以关于胶州领土铁路矿产及海底电线为尤要，放弃以与日本。

所有在青岛至济南铁路之德国权利，其所包含支路，连同无论何种附属财产，车站工场，固定及行动机件，矿产，开矿所用之设备及材料，并一切附随之权利及特权，均为日本获得，并继续为其所有。

自青岛至上海及自青岛至烟台之德国国有海底电线，连同一切附随之权利特权及所有权，亦为日本获得，并继续为其所有，各项负担概行免除。

（二）第157条，在胶州领土内之德国国有动产及不动产，并关于该领土德国因直接或间接负担费用实施工程或改良而得以要求之一切权利，均为日本获得，并继续为其所有，各项负担概行免。

①陆征祥1919年4月24日给北京政府外交部的密电。转见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七卷第317页。

②同上书第318—319页。

除。

(三) 第 158 条，德国应将关于胶州领土内之民政军政财政司法或者其他各项档案，登记册，地图，证券及各种文件，无论存放何处，自本约实行起三个月内移交日本。

在巴黎和会召开之前，中国人民曾对和会寄予很大的希望，但结果却毫无所获，而日本夺取我国山东的权益却被和会所起草的条约明文规定了下来。而且，规定的详尽，措词的强硬，无一不是对中国的最大侮辱。因此，连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也不得不承认：“此次和会条件办法，实为历史所罕见。”^①

对于这样屈辱的条件，北京政府的外交代表竟打算签字同意。5月1日，首席代表陆征祥在致大总统徐世昌、总理钱能训的密电中说：“有三端关系，亦不能不加熟审：一，对日关系，公约虽不签押，而日本仍可根据一九一五年约，向我直接请再订约，将举所允日本之条件，完全承认。倘彼时势仍不能不签，则较之现在公约签字，事实则一，威望更逊。二，对德关系，倘单独与德订约，则所得权利能否比公约所许为优。三，对英法美关系，此次经三国讨论数日，而结果仍然如是，在我虽属不平，而在彼亦有种种苦衷，难免不于彼我感情因此妨碍，且于日后一切亦不无多少之关系。”^②

至此，由于巴黎和会上各帝国主义国家的不公正裁决，中国在这次和会上的外交活动，完全失败！这是爆发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线。

(二) 南昌各校师生的请愿游行

在声援和参加五四运动的爱国斗争中，江西的进步知识分子是

^{①②}陆征祥1919年5月1日致北京政府密电。转见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七卷第321页。

最先觉悟的革命力量，站在斗争的最前列，起着先锋和桥梁的作用。早在1919年上半年，报纸上不断传来中国外交受挫、日本将要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的消息时，江西的“学界诸君，愤国势之凌夷，痛青岛之失败，已久有力争之议。”^①这说明，内忧外患交织的江西知识分子，为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抗争，已有较长时间的思想和舆论准备。

北京五四运动的消息于5月7日传到南昌后，爱国的知识分子异常愤慨，“一星期以来，各学校因山东问题已发生一种激昂之暗潮，屡开秘密会议，各学生所表示之态度，均激昂慷慨，且极坚决，故各校校长及教员一致加入运动。”^②他们推派代表前往百花洲苏公圃开会，讨论声援办法。当他们得知上海、南京、山东、九江等地的师生群起声援时，“均主游行警告”。^③会议决定：5月12日，组织游行警告团，举行全市各校师生大游行，向江西当局请愿；组织乐队，预备旗帜，印刷各种白话传单，以备游行时散发；各校选出纠察，维护游行秩序，防止意外事件发生。

5月10日，南昌各校师生致电大总统、国务院和各部总长，要求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力争收回青岛，释放被捕学生，惩办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三个卖国贼。电文指出：“青岛濒危，同深哀愤，务恳急电陆王专使，据理力争，万勿签字，并请废除中日前后密约，一洒奇耻。曹章卖国，举国哗然，北京学生，迫于义愤，致有本月四日之举，乃报载将解散大学，并处被捕学生以死刑。如果施行，则人之爱国具有同心，诚恐前仆后继，杀不胜杀。因恳蠲寝原议，迅予释放，学生幸甚，大局幸甚。”^④

5月12日，南昌各校师生请愿游行开始。上午8时，在各校代

①③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5月18日第6版，本辑第68页。

②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5月18日第6版，本辑第72页。

④《申报》1919年5月15日第7版，本辑第66—67页。

表钟祥鹭、丁伟、仇春生等带领下，省立农业专门学校、甲种工业专门学校、公立法政专门学校、私立法政专门学校、豫章法政专门学校、第一师范学校、第一中学、第二中学、心远中学、大同中学、豫章中学、基督教青年会英文学校、第一区第一高等小学、第一区第二国民学校、第一师范附属小学、新建县高等小学、私立监狱学校等十七所学校共三千余人，来到皇殿侧公共体育场，“各校校长及管教员等亦多随队前往。”^①“大如公共体育场，乃无一隙地。各学生来者，面上均现出一种悲壮肃穆气象。”^②上午11时，各校师生陆续到齐。游行队伍，高举国旗，以军乐队为前导，省立农专学校领头，其他各校紧随其后，每人手执白旗一面，上书“诛卖国贼”、“抵制日货”、“同胞速醒”、“力争青岛”、“救被捕之北京学生”等字样。游行队伍从公共体育场出发，经贡院侧、营坊街先后到省议会、督军公署、省长公署、省教育厅、省总商会请愿，要求立即致电北京，释放被捕北京学生，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当学生代表转达请愿师生的要求时，省议会、督军陈光远和省长戚扬均答应代表的要求，并对师生的爱国行动表示称赞。

学生游行时，沿途散发白话传单和《警告》小报，群情极为激昂。当游行队伍经过各街道时，“沿途观者人山人海，而贩夫走卒以及妇女老稚莫不感动，甚有见旗帜而下泪，向队伍而脱帽致敬者。”^③气氛极为热烈。

南昌师生的请愿游行队伍，经章江门、广润门到合同巷总商会请愿后，再回到公共体育场。这次请愿游行从上午8时到下午4时，历时8个小时，大家虽然忍受着饥渴，心情却极为兴奋。随后，二中代表丁伟和一中代表熊式一向大家报告省议会和军民两长

①《申报》1919年5月17日第7版，本辑第71页。

②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5月18日第6版，本辑第68页。

③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5月18日第6版，本辑第69页。

接见情形，并勉励大家务必毅力坚持，达到目的而后已。同时，又提议游行所用的旗帜，一律保存。大家热烈鼓掌，表示赞同。丁伟等还提出，从今日起各校不用日货，劝导亲友提倡国货，并高呼：“中国万岁”、“青岛万岁”、“学界万岁”，然后散会。^①

南昌学生游行请愿后，立即致电北京大学暨各学校，报告请愿游行的经过。电文说：“敝团于大中华民国八年五月十二日，举行全省省会学生游行警告，为示威之举动，并请愿于省议会、军民两长、教育厅、商会各机关，痛辞请电，极力协争，我视同生命之青岛决不可断送，我视如蛇蝎之密约决不可存留，我视同神圣之北京学生决不可拘禁。”^②并且认为，南昌学生的声援斗争与北京学生的斗争是风雨同舟的，希望北京学生“时锡南针”，多加指导，以免“闭户造车，恐难合辙。”^③

南昌师生的这次请愿大游行，是江西学生第一次大规模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斗争，在省内外有很大的影响。上海《民国日报》以《赣垣学生之爱国运动，全城学生之游行会》为题，刊登了一千五百多字的长篇报道，认为“事属创举”。^④并说：“省教育向来黯然无闻，此次外交失败，乃有国民游行之事，闻者诧为创举。”^⑤《申报》也以《赣学界游行警告团经过记》为题，报道了这次游行的经过。就连英籍犹太人爱资拉在上海办的英文《大陆报》，也于游行当天从南昌发出通讯，惊呼：“江西人性质素来保守，今乃有此举动，殊不容轻视。”^⑥

全市男校师生游行警告后，各女子学校也继起响应。5月12日下午，由省立女子师范和葆灵女书院学生发起，女子职业学校、义务女学、女子公学等一致赞同，在女师召开各校校长和学生代表会

①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5月18日第6版，本辑第71页。

②③《申报》1919年5月19日等7版，本辑第72页。

④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5月18日第6版，本辑第68页。

⑤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5月23日第7版，本辑第149页。

⑥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5月18日第6版，本辑第72页。